

专刊导言

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马忠文

日记与信札都属于比较特殊的私家文献,既是第一手材料,具有原始性,又有很强的私密性。不少学者对日记和信札多有青睐,喜欢据之进行学术研究,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文献不止提供材料和历史信息,还有心灵沟通 and 情感的因素,说到底,它们是一种有温度的文献,容易唤起人们(包括作者和读者)的亲近感和共鸣。引用日记、信札材料的文章往往情节丰富,很快能将读者带入历史场景中。

当然,使用日记、信札进行研究和写作的维度会有所不同。既可以将其作为多种文献类型之一,用于一般的史学研究中;也可以通过对特定日记和信札的考察、分析,反窥历史中的某个片段和环节,揭示某些内幕,澄清某些隐情,推动研究进步。后者似乎更具有文献学研究的特点。

《文献》本期特设专刊,选编的12篇文章都是以日记和信札为核心材料的研究,揭示了清末以来政治、社会和学术层面的不同面相,其中不乏精妙的论证和细致的考订,对推动学术进步均有助益。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也改变了传统士人群体的人生道路。向东通过对民初遗老曹元忠致同道张锡恭的一封信札的考释,还原了辛亥壬子之际遗老学者的心路历程。与张锡恭在清帝退位后即“决意归隐”的志趣不同,曹元忠则存有“与清室共存亡”的心态,以表达其忠诚,但迫于形势,最终也与张锡恭一样,渐渐远离政治,走上了归隐治学的人生道路。信中所谈读书、藏书、治学情况,以及对缪荃孙、陈宝琛、劳乃宣、顾麟士、于式枚等人行迹的反映,可以窥见清遗民学者之间思想交流和交往的真实情形,于近代学术史、文献史研究有一定补益。文章引证王欣夫学礼斋所藏写本《笺经室文存》(现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和张锡恭《茹荼轩日记》稿本,以及《艺风老人日记》《劳乃宣自订年谱》《沧趣楼诗文集》《笺经室诗存》等,生动呈现民初遗老世界鲜为人知的一个侧面。

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中学人之间讨论学问,因空间限制,大部分都通过

书信往来才能实现,到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学者之间仍旧承袭了这种便捷而亲切的论学方式。1925年前后,藏书家叶景葵购得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1935年10月至1937年8、9月间,他开始与钱穆、顾廷龙、顾颉刚诸位学者通信,围绕此稿本展开学术讨论。虽然,在他1941年撰写的三千余言的《读史方輿纪要稿本跋》中,对诸位学人的交流原委有过说明,但是,远不如今天利用各位当事人的信札、日记等原始文献,还原历史现场,进一步感受当年的历史情境。丁小明、柳和城以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顾廷龙往来信札为核心材料,从版本学层面分析了二顾、叶、钱等学者在讨论《读史方輿纪要》稿本性质过程中的质疑、求证与趋同,为读者展现学界前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谦逊的人格魅力。

20世纪30年代也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繁荣时期。1934年9月下旬至1939年8月末,王重民以国立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的身份被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法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建立联系。刘蕊从保存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档案中发现一批王重民的未刊信函,通过对其中七封关涉法藏敦煌遗书整理工作的信函写信时间和内容的考订,进一步明晰了王重民编纂法藏敦煌目录的详细过程,以及王、伯二人就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编目工作所进行的探讨和交流。伯希和曾介绍王重民在伦敦、莱顿图书馆进行各项调查和研究,并将自己亲笔抄录且封存三十载的“千佛洞壁史料”手稿示予王氏,还推荐王重民加入法国亚洲学会,足见一位学界前辈对后辈的赏识和提携。

赵大旺则对王重民旅法期间致顾颉刚两封信的写信时间和史料价值进行了新的考订。第一封信收入1937年1月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10期,因受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女士回忆的影响,以往被认为写于1936年10月20日,经过作者考订,确定是同年11月20日所写;而另一封收入顾颉刚、顾廷龙编《尚书文字合编》附录中的王重民书信,原无时间,也被考订出为1936年11月26日所写。这两封信前后相继,揭示出王重民受顾颉刚委托在旅欧期间调查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尚书》写卷的详细情况。文章也还原了30年代伯希和向顾颉刚提纲供敦煌文献清单、国内学人与国际汉学界(包括日本学者)交往的部分细节。

楼培以1975年4月3日顾颉刚致沈文倬的一通佚函作为切入点,回顾这两位学者的早期交往,揭开一段涉及近现代礼学、经学研究的学术因缘。作者结合顾颉刚日记、信札等文献,指出顾、沈二人早在1940年代便订交,顾氏视沈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抗战胜利后沈文倬入职国立编译馆,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上海图书馆,都与顾颉刚的支持和举荐有很大关系。

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于1930年代在山东省立图书馆任职期间,曾网罗诸本,着手校理宋人汪元量《水云集》。对于此事经过,石祥通过研究山东省

图书馆所藏一部清乾隆三十年鲍廷博刻本《水云集》并《湖山类稿》上的一则王献唐题跋和书后粘贴的一封赵万里致王献唐信,揭示出王献唐校理汪集过程的一些细节。即,1933年赵万里应王氏之邀,在一部鲍刻本《湖山类稿》上过录了王国维、赵万里合校本的校语,寄给王献唐,王氏后来的校本,实际包含了多个版本的文本面貌。王献唐将自己校勘《汪水云集》的底本——海源阁流出的黄丕烈旧藏王孝咏本——误认为是王乃昭本,这个误解也在本研究中得到澄清。

清季伊犁将军长庚经营新疆二十多年,是晚清西北边疆举足轻重的人物。章成利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藏一批长庚的未刊信札,对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间科布多与新疆两地就阿尔泰山地区的治权争议进行细化研究,揭示出长庚考察阿尔泰山、调停多方矛盾、筹边谋划、控制全局的内幕与过程。正是在长庚的调解下,经各方官员联衔奏请,才将争议地区分治,平息了这场长达数十年之久、极有可能危害边疆安全的利权纷争。相比以上各篇论文,本文偏重书信史料的整体利用与研究,更多体现信札文献之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意义。

日记是编年体的文献,逐日叙事,虽嫌琐碎,却别有用处。从零散记载中搜寻到些微的证据来解决一桩历史悬案,是学者发掘日记珍贵价值的极致案例。另一方面,日记又具有整体性资料的特点,通过一段日记往往可以看出日记撰者的生活特性或人物的定位,官员日记与学人日记因记事侧重不同而产生差异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英和是嘉庆、道光年间清廷重臣,清中期满洲科举世家的代表人物。郑小悠文介绍英和《壬戌扈从随笔》与《奉使陕甘日记》两部日记手稿。前者记述嘉庆七年(1802)七月至九月英和随扈嘉庆皇帝木兰秋狝及拜谒东陵的经历,披露了清代巡行体制、宫廷生活、行宫与围场地理状况、围猎路线及士大夫群体交往等大量历史信息;后者记述嘉庆十一年二月至八月英和奉旨与内阁学士初彭龄同赴甘肃查办案件的沿途情形,五个多月途经四省、二十二府、七十餘州县驿站、递铺,反映出清中期北方官道及地方供给的真实境况。因为日记中保存有大量自作诗、应制诗及僚友唱和之作,作者又搜罗现存英和各种诗集的稿本、抄本、刻本,对上述诗作进行对比研究,进而考察英和《恩福堂诗钞》的成书过程及其诗学成就,使两种日记的学术价值得到充分的揭示。

同类型文献的对比研究,也能碰撞出火花。贾宏涛通过对读翁心存、翁同龢父子1860年至1862年共同居京期间的日记,发现二人日记在书写法则、措辞语气、内容编排上存在种种雷同,从而推断文化家族内部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互相阅读和模仿的现象,进而认为家族日记的私密性相对比较薄弱。同时,作者发现,翁同龢日记不仅在记录时间上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内

容也更具随意性,这提醒人们不宜孤立地看待或使用一种文献,只有在对比照中才能发现其局限性,日记也不例外。

一些官员、文人记日记本身也有保存文献的意图。杨凯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方濬师《安宜日记》稿本,除记述行事、见闻外,还将每天与亲友朋僚的往来书信或撮录要义、或照录原文地保留下来,不到十二个月的日记中存札多达346通。其中李鸿章、曾国荃、长善、张树声等人的部分手札,内容从未披露过,对研究中法战争史等颇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些保存于日记中的函札,与历史人物日常活动的时空和语境相伴,更易于读者了解相关史实的背景与细节。

徐森玉是近代著名文献版本学家。孙玉蓉通过阅读京师图书馆工作人员俞泽箴的日记,对20世纪20年代徐森玉掌管京师图书馆时期的状况有了新的认识。尽管徐氏本人留下的相关文字不多,却在“他者”的记载中可以清楚看到其活动的痕迹,显得弥足珍贵。俞泽箴日记记述下徐森玉为馆务奔走操劳、设法保护馆藏善本及协调帮助浙江图书馆完成《四库全书》抄补工作的种种艰辛努力,更加客观地再现徐森玉恪尽职守、躬亲其事的精神,提供了其他史料所不及的丰富细节与详情。

张诗洋从南京图书馆所藏佚名文献中,发现了42册新月社成员、曾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的日记稿本,多是他任清华学校(大学)、南开大学任职期间的生活与工作记录。他与兄长张伯苓、梁启超、徐志摩、胡适、吴宓、梅兰芳等名人的密切交往,以及接待泰戈尔访华、排演话剧《齐德拉》、主持清华学校改革、见证新月社与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情形,都在日记中留下痕迹。张氏日记的发掘,对研究民国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都将有可期的推动作用。作者也指出,因时时处在人事纷争中,张彭春的某些叙述难免有主观偏见,日记中也有传闻失实的情况孳杂。因此使用日记史料,需要研究者持客观公允的态度,做更细致的甄别和考辨。

应该承认,利用日记、书札等原始文献,研究的都是具体问题,可能澄清了一些疑难,推进了某些研究,丰富了相关历史细节,但是,也不能过度依赖这些稀缺文献。文献类型各异,年谱、文集、报纸,各类文献本质是平等的。说到底,研究中没有哪一类史料能够包打天下。日记、信札虽是考订历史细节的绝好材料,也要与其他不同类型的资料对应互证,方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显示其独特价值。与此同时,也还需要我们不断充实理论素养,拓宽学术视野,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只有在宏大精深的理论思维观照下,像日记、信札这样的珍贵史料才能被“点石成金”,散发出耀眼的学术光芒。